

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

李隆獻**

〔摘要〕

本文以「孔子形象」的形塑與演變為論述焦點，針對先秦至漢初文獻——包含傳世與出土——涉及孔子重要事蹟、言行的相關篇章比較、分析；並由敘事學觀點切入，詮釋不同文獻在「孔子」人物形象及其敘述策略、主題與價值觀的異同與意義。

本文主在比較《左傳》、《國語》、《史記》、《公羊傳》、《穀梁傳》等先秦至漢初敘史、詮經文獻，並參照先秦諸子，乃至近年出土之《清華簡》、《上博簡》、《郭店簡》等之相關載述，省察「孔子形象」在「良臣」、「聖賢」、「先師」諸面相的不同定位、評價與嬗變，及其對當代學術的意義。

在上述文獻考察與詮釋基礎上，本文亦欲探論先秦至漢初經學、史學發展之背景與趨勢，並嘗試分析在不同時空情境、學派立場、論述策略與價值觀點下，眾多不同學派、背景的文獻與論述，形塑「孔子形象」的特色，及其學術意圖與意義。最後則透過「孔子形象」此一命題，綜觀出土與傳世文獻並茂、經學與史學交融的先秦漢初學術場域，其學術的變化與意義，以及出土與傳世文獻的學術貢獻——嘗試在不同文體、敘事模式與史觀的對話間，省思傳統學術的多元風貌。

關鍵詞：孔子、敘事、《左傳》、《國語》、《史記》

*本文乃筆者2013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先秦兩漢歷史敘事的省察與詮釋」之部分成果，蒙蔡瑩賢弟協助蒐集資料，撰擬草稿，議論疑義；初稿曾於「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4年5月24-25日）宣讀，惠蒙胡楚生先生謬賞，謹此一併申謝。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一) 近世「孔子」研究述略與本文研究重心

歷代討論、考證，或敘述孔子事蹟者，堪稱汗牛充棟：經學固不待言，史學方面，自太史公特立〈孔子世家〉與〈仲尼弟子列傳〉，完整編年載錄孔子及其弟子之行事，正式賦予孔子崇高而神聖的地位與意義，也描繪了孔門學術的整體概況。經、史學如此，各類思想史、先秦學術與儒學研究，其論及孔子者亦不勝枚舉。各種傳統典籍所載與漢宋諸儒所論，固為學者所熟知；即就近世而言，研究成果亦頗為豐碩：乾嘉以來，針對孔子的生平行事進行完整考訂乃至辨偽者，首推崔述《洙泗考信錄》，崔東壁希望還原孔門的真實形貌，罷黜戰國以降的偽書雜說，乃至敢於質疑《論語》所載有乖孔子之行事，¹而就孔子之相關載錄進行實事求是的探討。及於近當代，則有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學者運用新的史學方法，企圖破除孔子的「聖人」形象，還其平易近人的面目，²亦有康有為借孔子之名宣揚「改制」，³引發種種討論；他如章太炎、劉師培、郭沫若、馮友蘭等方家，亦皆曾就孔子的特定作為、形象、歷史定位等面向作出論述。⁴上述各家，雖

¹ 如辨《論語·陽貨》「公山弗擾以費畔」一條曰：「《左傳》費之畔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為魯司寇，聽國政。弗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興之業而圖未成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見崔述：《崔東壁遺書——洙泗考信錄·卷二》「為魯司寇下」條（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2，頁15-16。

² 如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收入《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第2冊，頁130-139；胡適：〈說儒〉，《東方文化》1卷1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單行本印行，收入《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15冊，頁5-98；傅斯年：〈評「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原載《古史辨》，第2冊，頁139-141，收入《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4冊，頁1499-1501。

³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⁴ 如章炳麟著，徐復注：《噶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劉師培：〈孔學真論〉、〈論孔子無改制之事〉（並見《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等文；關於近世學者對孔子之各種研究，已有不少學者進行統整與論述，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論，可參考林甘泉主編：《孔子與20世紀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王錕：《孔子與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等專著。

或多或少帶有論述者的學術或政治目的，但亦不失為由新視角、新觀點詮釋孔子的特定形貌。部分學者，或重寫孔子「新傳」、或編纂孔子研究資料，前者如白川靜、錢賓四等先生之撰寫孔子傳，⁵後者則早期有清儒馬驥（1621-1673）《釋史》之立〈孔子類記〉，收錄相關事蹟，⁶孫星衍（1753-1818）《孔子集語》之廣蒐孔子資料；⁷近期如山東、上海等地區亦相繼出版《孔子研究資料》、《孔子文化大全》等文獻彙編書目。⁸西方學者則或由文化史觀點省思孔子地位與影響等問題。⁹

上述前賢研究，皆博學慎思、好古敏求；然而，以今日之學術發展言，不論傳統或近代的孔子研究，雖論述繁多，質量俱精，卻仍留有一隅之地，尚待吾人之反思與發明。

近世以來，傳統學術面臨不少新材料與新思潮的衝擊，其對孔子研究的影響約有三端：首先，晚清以降，受西方學術與疑古思潮影響，學者不再侷限於以經學為主之學術史觀看待孔子的形象、地位與事蹟，也逐漸具有更為多元的視角，近世各類哲學史與中國史論著提到的孔子，頗有由個別學科的觀點，對孔子進行詮釋者。其次，隨著各種學科的獨立與諸子學研究的興起，不少學者也逐漸傾向於闡發個別史書、子書的價值，而不再將其地位與意義侷限於《春秋》經之下，則子、史文獻載錄的孔子形貌，也應獨立討論、辨析；崔述與古史辨學者的論著，已有不少涉及此一議題。最後，隨著大量出土文獻問世，一方面補充了傳世文獻的載錄，同時也多少挑戰了傳統文獻的內容，則現代學術必當正視傳世與出土文獻的互涉與意義；出土文獻中，頗有與孔子相關的篇章，一定程度對傳統研究有了不同的補充與擴展，自為學人所須考量之新材料，而各類孔子資料彙編，多未

⁵ [日] 白川靜：《孔子傳》（東京都：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香港：香港大學，1956年）、《孔子傳》（臺北：聯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⁶ [清] 馬驥撰，王利器整理：《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 86，頁 1888-2103。

⁷ [清] 孫星衍撰，郭沂校補：《孔子集語校補》（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

⁸ 相關書目如李啟謙、駱承烈、郭克煜編：《孔子研究資料》（山東：曲阜師範學院孔子研究所，1981年）；姜義華、張榮華、吳根梁編：《孔子——周秦漢晉文獻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李啟謙、駱承烈、王式倫編：《孔子資料匯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年）；李啟謙、王式倫編：《孔子弟子資料匯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年）；楊朝明、修建軍主編：《孔子與孔門弟子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

⁹ 如美國學者 Michael Nylan and Thomas Wilson. *Lives of Confucius: Civilization's Greatest Sage Through the Ages*, Crown Archetype, 2010。

及收錄出土文獻。上述三端，已有部分反映在前賢的論著中，唯也仍有尚待探論的空間。凡此，雖非區區拙文可以道盡，然些許嘗試，或亦能有拋磚引玉之效。是故本文擬針對先秦至漢初傳世、出土文獻有關「仲尼」、「孔子」的「形象」進行爬梳與討論，做一初步嘗試，敬祈海內外博雅君子不吝賜正，是所盼禱。

關於孔子的形象，早期學者通常透過撰寫孔子傳記呈顯其整體面貌，又或者在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著作中設立專節，展現孔子的特定形象、地位與影響；近年來，亦有專篇論文討論史傳中不同的孔子形象，如學長朱曉海先生〈孔子的一個早期形象〉，爬梳先秦漢初子史文獻，指出其中確實有某些涉及神祕或迷信色彩的描繪，實際上也屬於孔子早期眾多形象之一，呼籲學人應平等、客觀面對這些載錄而非避而不談：

上述在今人看來頗具神祕成分及色彩的部分確實是孔子原始諸多形象之一。如果有人覺得事涉迷信，則我們要提醒他們：「迷信」正是當時歷史文化的真實情境，忽視這部分，或嘗試解釋掉這部分所依據的文獻，甚至堅拒接受，才真正反映了今人對某些成見的迷信。¹⁰

同仁伍振勳先生則專就《史記·孔子世家》進行分析，指出史遷所經營的「聖人敘事」，實反映了漢代經學的價值體系：

〈世家〉不僅是一本孔子傳記，也是一部將孔子生平塑造為神聖典範的聖人敘事——在「以年為敘」的章法中開展「誕生與執政→歷險與自歸→創作與死亡」的情節脈絡，並藉由這一情節脈絡將孔子生平塑造為涵蓋政治事功、文化精神、政教律法的神聖典範。……從傳統經學的學術脈絡加以檢視，〈世家〉的聖人敘事，在實踐指涉方面，乃是再現漢代經學的文化模式，因而具有經世致用的行動效應；在知識意涵方面，則是再現漢代經學的價值體系，因而具有價值詮評的思辨效應。¹¹

¹⁰ 朱曉海：〈孔子的一個早期形象〉，《清華學報》新32卷1期（2002年6月），頁27。

¹¹ 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清華學報》新39卷2期（2009年6月），頁253-254。

朱、伍二文，提出兩個重要且值得省思的研究方向：朱文點出在面對各種不同性質文獻所呈現的不同孔子形貌時，實應暫時擱置某些特定的「前理解」或成見，嘗試由較為超越的視角觀察、反思其何以如此呈現，具有何種目的，又與當時的文化背景、學術情境有何關聯；伍文則說明了「敘事觀點」與詮釋角度的重要性，即當史遷著意以「聖人」描繪孔子時，其相關生平事蹟亦將配合此一敘事目的而調整，甚至經過一定程度的剪裁、編撰。又，以敘事學觀點言，不論哪一類型／學術派別的文獻，只要具有不同的論述目的，則其敘事手法、載述偏重即可能隨其文體／目的而有所不同。亦即儘管文體／敘事模式近似的兩種文獻，仍可因立場／觀點的差異，而呈現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與事件論述。筆者曾透過探討《左傳》、《國語》與出土文獻——如《上博楚簡》、《清華簡》——記載同一歷史事件，說明同一事件／人物在不同敘事模式或立場論述之下，便會傳達出不同的意涵與論述重點。¹²換言之，若擺脫漢代以降定於一尊的「儒學」、「經學」孔子形象，而採取較開放的態度看待先秦、漢初的各種孔子載述，或許可以觀察不同的面貌與詮釋傾向，並嘗試詮釋其意義所在，此為本文之主要興趣所在。

另外，隨著二十世紀後期以降各類出土文獻的問世，亦可讓吾人再度省思各種孔子傳記資料的考辨意義。事實上，上述各種研究，無形中都在界定何種文獻、資料當為「信史」，何種文獻、資料僅能做為「參考」，甚至有些還遭指斥為「偽書」、「雜說」而不能作為引據之資。如何定生先生即論斷曰：

孔子傳記的原始資料，今日可依據的只有三部書：一是《論語》，一是《左傳》，再就是《國語》。¹³

何先生明白宣稱考察孔子的事蹟形貌，唯此三書可信。《左傳》敘史之富贍，確為理解先秦歷史與人事的重要參考，《論語》更是學界公認理解孔子言行的最重要文獻，以《左氏》、《論語》為信史，自然無可厚非。但如此的前理解與選材是否真正萬無一失，對照今日的出土文獻，實堪再次斟酌、思辯。《左傳》、《論語》固然距仲尼未遠，其所載述的孔子事蹟自亦相當珍貴，但尚須考量的是，先秦時代

¹² 可參拙作：〈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0年6月），頁147-196；〈先秦敘史文獻「敘事」與「體式」隅論：以晉「欒氏之滅」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0期（2014年5月），頁1-42。

¹³ 何定生：《定生論學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頁97。

——尤其是戰國時期——有了百家爭鳴的諸子學，各家各派其實都曾述及「孔子」事蹟。近年出土的簡帛文獻，時亦可見「孔子」載述。往昔學者以《莊子》借「孔子」為嘲諷謬悠之詞而不之信，然今日出土簡帛在其性質、論述目的均未完全明確之前，卻似乎能博得眾人的信賴，認為是補充孔子事蹟的珍貴資料。信信、疑疑之際，似乎有重新省思、討論、分析的必要，此亦為本文刻意探討先秦至漢初各類孔子事蹟的內在動因。

（二）研究材料與研究方法

先秦至漢初文獻，除《論語》直接記錄孔子言行外，尚有三種呈現孔子形象的主要型態：

- 一、作為實存的歷史人物而被敘述、描寫，具有各種形象與事蹟；
- 二、作為超然的評論者，以「仲尼曰」／「孔子曰」的型態，評論歷史事件、人物；
- 三、作為假設性人物，或應用孔子故事以寓含事理，或稱引孔子以為自身理論之論據。

前二者主要出現在敘史文獻，如《左傳》、《國語》、《史記》，以及少部分諸子書中，第三類——與第二類的一部分——則散見諸子書，如《墨子》、《孟子》、《莊子》、《韓非子》，乃至漢初的《春秋繁露》、《韓詩外傳》、《說苑》、《新序》等典籍。

其中，第二類的「評論」型態，筆者已撰有〈《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¹⁴探論之，主要透過敘事學觀點，探討《左氏》敘事立場與「仲尼曰」言論間的辨證關係；另有〈試論《左傳》「仲尼曰」敘事的經史學意涵〉，討論孔子、《春秋》與《左傳》三者間的關係，¹⁵此文基本上回應經學相關議題，而輔以歷史敘事的觀點，省察《左傳》此一亦經亦史的先秦經典，如何引述孔子、運用其言論，呼應經、史學議題。而關於諸子書的孔子敘事，則因其主要目的為闡述自身學說，孔子僅作為舉例、證明之用，敘事、紀實遠非其根本意圖，如此，則有第一類型

¹⁴ 文載《臺大中文學報》第33期（2010年12月），頁91-138。

¹⁵ 於「第二屆中國經典文獻的詮釋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主辦，2014年10月17-18日）宣讀。

態與第三類型態難以區分的問題，亦即吾人實無法明確指出哪一部子書所載必然屬於「真實的」孔子事蹟，何者又屬於「虛構的」、「寓言式」的孔子；但因其皆攸關「孔子形象」，故本文將側重於討論第一類與第三類之部分文獻，其他資料則將適度參照、比較。

本文以「孔子形象」為研究焦點，而著重於敘史、詮經以及諸子文獻如何敘述孔子其人其事，及其所營造的孔子形象與該文獻性質的關聯，並探究其敘事意圖與歷史文化背景。換言之，關於孔子先世的考訂與孔子的交遊、¹⁶孔門弟子事蹟，¹⁷乃至孔子某些特定或爭議事蹟之真偽與考辨，¹⁸皆非本文首要析論對象，而僅在能本文印證時提出論述。另外，出土文獻有不少篇目被歸類為儒家文獻，其中雖或提及孔子，然實多借用其師弟問答形式以論述理論，¹⁹其內容實未真正涉及孔子之敘事，而偏重於儒家思想、義理之發揮，與本文之論題並未直接相關，本文亦置而不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類出土文獻的文本形式，與《論語》、《國語》的論述形式頗有可對比、發明之處，可啟發思索先秦文體的概況，故亦將於涉及相關論題時提出討論。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討論的素材以敘史、詮經文獻為主，並及部分子書、出土文獻的敘事段落。傳世文獻主要有《左傳》、《國語》、《公羊》、《穀梁》、《史記》等敘史、詮經文獻，以及《墨子》、《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等諸子書之具有敘事性質的特定段落；出土文獻則有《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等與孔子相關的篇章。本文之〈二〉將由《左傳》、《國語》出發，討論二書載錄的孔子事蹟呈現的孔子形象，及其可能的敘事傾向；〈三〉則討論出土與諸子文獻載錄的孔子事蹟，分析其特色，說明先秦時期對孔子形象的可能理解與詮釋；〈四〉則在前二節的論述與前人研究基礎上，比較《史記·孔子世家》與先秦文獻中孔子形象的異同，藉此呈顯不同文獻的敘事意圖與詮釋

¹⁶ 如《左傳》所載孔子之父祖，以及孔子與陽貨之相關事件，或《世本》所載孔子世系等，雖與孔子之出身、成長背景相關，但並非孔子事蹟的直接陳述。

¹⁷ 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

¹⁸ 如孔子是否誅少正卯，或其周遊列國之時、地與繫年等。以上議題，學者論述已多，如楊義先生《論語還原》即有相當精闢的考辨與詮釋。

¹⁹ 如《馬王堆帛書·周易》後附之〈二三子問〉，即透過二三子與孔子的問答，闡述《易》理、德義與君臣關係；或如《孔子詩論》稱述「孔子曰」以論說《詩》意，但並未多述孔子事蹟。

傾向。

本文引用之《十三經》經文、傳文、注、疏、《校勘記》等，皆據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十三經注疏》刻本。《國語》則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標點三國吳韋昭《國語解》，其篇名、韋《解》皆據此本。《史記》則據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方研究所，昭和七年，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爲免繁瑣，諸書皆僅於引文末標注卷數、頁碼，讀者察之。

二、《左傳》、《國語》的孔子形象

（一）《左傳》的孔子敘事

《左傳》有關孔子事蹟的載述——不包含「仲尼曰」／「孔子曰」等評論內容——各家統計與認定的數目雖小有出入，大致約有十餘則。就內容言，可概分爲三類：一、說明某人從學、問禮於孔子，或顯示孔子的博物多聞；二、敘述孔子實際進行的政治作爲與言談；三、孔子以外的人、事，然與孔子密切相關，或事件發生時孔子得以立即聽聞而論評之，就性質言，較類似「仲尼曰」／「孔子曰」等評論，對呈現孔子形象僅有間接作用。本節以前二類爲主要論析對象，而以第三類爲佐證之資。

1. 博文與知禮

第一類資料計約四、五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左傳》敘述某人從學於孔子的兩則載錄，都以「預敘」方式呈現。較爲單純的一則爲襄十年《左傳》在偃陽之役後的記載：

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左傳正義》，卷31，頁7下）

此則爲「仲尼」用爲評論之外，首次出現在《左傳》的敘述，時距孔子之生尚有十二年，該事件與孔子亦無直接關係；不過偃陽之役，《左傳》詳細載錄了魯國三位力士秦堇父、邾人紇、狄虎彌的事蹟與戰功，其中邾人紇即孔子之父。當其時，

秦丕茲亦未出生，故此則戰後載錄，相當明顯以預敘方式延續秦堯父與邾人紇的戰功，連及二人之子的師弟關係。杜預《注》：

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左傳正義》，卷 31，頁 7 下）

明白指出《左傳》預敘此事的用意，也可見《左氏》對孔門學人的特意重視與用心載錄。

較為複雜的事例則是昭公年間孟僖子相禮事，昭七年《左傳》載魯昭至楚事云：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左傳正義》，卷 44，頁 6 下-7 上）

魯昭至楚，乃因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意欲炫耀國力，中原諸侯初無至者，僅有魯國被迫獨來，處境已頗尷尬，孟僖子又於「相儀」、「答郊勞」諸禮皆力有未逮。²⁰魯國此行，內在心態畏懼楚國之威嚇，外在威儀有失君國之體面，堪稱狼狽不堪，無怪回國後孟僖子要為自己「不能相禮」感到萬分懊惱，故在病革之際，慎重叮囑子孫務須學禮：

九月，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

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²⁰ 見昭七年《左傳》，《左傳正義》，卷 44，頁 5 上-7 上。文長不具引。

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左傳正義》，卷 44，頁 16 上-17 下）

此段載錄值得注意者有三：一、孟僖子並未死於此時，乃至十七年後的昭公廿四年方卒，此時的孔子也只是十六七歲的少年；則在十七年之前的昭公七年，《左傳》便已探下預敘，其用意或許正在藉此強調「仲尼」與「知禮」的重要性與關聯性。二、這段「將死之言」篇幅相當長，並且引經據典述及孔子先世，極有可能經過《左氏》相當程度的修潤，其直接稱孔子為「將有達者」、「聖人之後」，尊崇意味頗高；同時「無禮，無以立」之語也與《論語》極為類似。²¹三、《左傳》預敘孟僖子將死之後，復引用「仲尼曰」評孟僖子「能補過」。參考昭九年《左傳》另一則關於孟僖子事蹟的載述：

孟僖子如齊般聘，禮也。（《左傳正義》，卷 45，頁 10 上）

昭十一年《左傳》又載孟僖子事云：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脩好，禮也。（《左傳正義》，卷 45，頁 18 下-19 上）

皆載錄孟僖子出使諸侯講「禮」的事蹟，可見僖子自楚返魯後，不論對自身禮儀的加強，或要求其子嗣學禮，確實表現努力「補過」之跡。不過昭七年「仲尼曰」的特殊之處是，此類評論通常出現在某人事蹟完結之後，頗有蓋棺論定意味，然昭七年時孟僖子未卒，此年以後亦陸續有相關載錄，則《左傳》何以特別提早預敘孟僖子將死而盛稱孔子與其二子師事仲尼事，復引用「仲尼曰」加以評斷？筆者以為可能的解釋有二：其一是，就事件的嚴重程度言，昭七年魯昭公被迫如楚，事關魯國尊嚴與外交成敗，孟僖子「不能相禮」理當受到批評，然而透過經傳所記，可知罪魁禍首實為好大喜功的楚靈王，則《左傳》透過預敘孟僖子的努力「補過」與推崇孔子，乃至引用「仲尼曰」賦予孟僖子正面評價，強調魯國的重「禮」，對比楚國的霸道與無禮；其二則是，表現出《左氏》推崇孔子的態度，在涉及「禮」

²¹ 《論語·季氏》：「不學禮，無以立。」（《論語注疏》，卷 16，頁 9 下）

以及孔門密切相關事件、人物時，特別點明其與孔子的關係，顯示《左氏》屬辭比事之際，孔門學人知禮的特質當為其所認識與推崇。

《左傳》尚有數則孔子博聞好學的載錄，如昭十七年郊子朝魯，議論「以鳥名官」的古史記事，²²郊子言論之後，《左傳》如此載錄：

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正義》，卷 48，頁 9 上）

又如哀十二年《左傳》載述魯國冬季而有蟲災的異象：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左傳正義》，卷 59，頁 5 上）

孔子由天象與曆法的角度，解釋何以入冬後昆蟲並未蟄伏。姑且不論其說解是否正確，由此載錄可知季孫知曉並肯定孔子之博學，故遭遇難以解釋之事，輒求教於孔子。此二則載錄，前者說明孔子之博聞乃因好學而得，後者則顯示孔子博學乃人所共知。

著名的「西狩獲麟」事，若姑且不論其褒貶與《春秋》絕筆之義，基本上也關乎孔子的博物多聞。哀十四年《左傳》載：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傳正義》，卷 59，頁 13 上-14 上）

獲麟一事，歷代學者之詮解，堪稱眾說紛紜。若單就《左傳》之敘述言，此段載錄最單純的目標乃是解釋《春秋》書「西狩獲麟」的緣由，²³說明原本獲麟者以為此物不祥，然孔子往觀，識其為仁獸之麟。所謂「取之」，當從杜預《注》所言：

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左傳正義》，卷 59，頁 14 上）

²² 《左傳正義》，卷 48，頁 3 下-9 上。文長不錄。

²³ 哀十四年《春秋經》：「春，西狩獲麟。」（《左傳正義》，卷 59，頁 11 上）

換言之，若非孔子的博識慧眼，則魯史極可能以麟為不祥之物，遂略而不書。

綜上所述，由前引二則以預敘方式呈現的孔子相關事蹟，可見《左氏》對孔子乃至孔門之學確實特別重視。此類關於孔子之好學，以及時人師從孔子的載錄，在《左傳》中相當獨特，除孔子之外，幾無其他人物涉及「學」的載述。相對的，關於孔子廣博多聞的載錄，雖為後世所公認，²⁴但若通觀《左傳》，則相較之下並不特別，因為尚有更多人物，如子產、叔向、季札、史墨等，《左氏》皆將其描述為博物君子，這些人物的言論亦常徵引古史、古制，較之孔子之相關載錄，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²⁵

2. 為政與行事

上述數則載錄，皆呈現了孔子「博文知禮」的概略形象，然並未敘及太多實際作為。《左傳》實際載錄的孔子行事，多為其在魯國出仕的政治作為，而多呼應其「知禮」形象。如定元年《左傳》載：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左傳正義》，卷 54，頁 6 下）

魯昭公因政爭而被迫出亡，甚至因為季氏之專擅，死後墓葬也未能保有國君之尊；²⁶孔子則設法在既成事實之下，以「溝而合諸墓」的方式，將昭公的墓葬與歷代魯君連結，維護其君主地位，由此可見孔子重禮與踐履的努力。又如哀十二年《左傳》載：

²⁴ 說詳下文。

²⁵ 諸如此類展現某些人物「博物多聞」的言論，亦可與《國語》記言的特色互參，然此議題非本文重心，可參蔡瑩瑩：《敘事、論說與徵引——論《左傳》《國語》的典故運用》（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李隆獻指導，2013 年）第四、五章之相關舉例與論述。

²⁶ 相關載述可參昭二十五年《左傳》所載昭公出亡之經過與季氏專擅之事，該年樂祁預敘而概括此事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左傳正義》，卷 51，頁 7 上）文長不具引。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綽，放經而拜。（《左傳正義》，卷 59，頁 1-3）

此則載錄與《論語·述而》「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²⁷呼應，因同姓婚故，魯昭夫人的葬禮有所隱諱；而就前引昭公葬「墓道南」觀之，在季氏把持國政之下，即連貴為國君的昭公也未獲應有的禮儀，遑論夫人。故「季氏不綽」乃不以夫人之喪為意，孔子雖一方面身為季氏從臣，但仍欲維護國君與夫人之尊，故「與弔」且「放經而拜」，既表達對君夫人的哀悼，也透過具體行動實踐其認為應有之禮節，並對季氏的專擅表達不認同，甚至譏刺之意。²⁸

由此二則載錄，具體可見孔子雖博文知禮，但其實際作為則因三桓——尤其是季氏——把持國政而艱困難行。孔子的各種行動，如「溝而合諸墓」、「放經而拜」，都在無法改變季氏專政的情況下，以其一己之力，盡最大的努力踐履禮儀，但也不無妥協與無奈。此為《左傳》所載的真實情境，也讓我們對孔子「好禮」的理解，不僅停留在言論的宣講或理論的陳述，而能更明確認識到，孔子是在何其艱困與複雜的政治處境之下，仍堅持並實踐其所認同的價值觀。綜觀《左傳》載錄孔子在魯相關事蹟，此一「無奈」幾乎貫串大部分的敘事底蘊，如孔子出仕時最重要的內政作為「墮三都」。事載定十二年《左傳》：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

²⁷ 《論語注疏》，卷 7，頁 9 下。

²⁸ [清]武億：《群經義證》〈春秋左氏傳〉：「放經而拜，注：『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氏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疏：『季孫既不服喪，孔子不得服弔服，故去經從主節制也。』案：《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注》：『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注：『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蓋君子救時之失有如此者。竊以放經而拜亦用此意，以譏季氏。如杜氏所云從主節制，非也。」（《清經解續編》〔臺北：復興書局影印清光緒十四年（1888）王先謙《南菁書院》本，1972年〕，第3冊，〈群經義證五〉，頁12上）案：不論「放經」之儀節意義是「從主」或「譏刺」，孔子往見季氏，已刻意使季氏見到自己身著喪服，就此一行動而言，孔子對季氏展現的態度顯非完全順從與認同。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墜。」

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正義》，卷 56，頁 9 下-10 下）

孔子弟子仲由（子路）為季氏宰，若有權力最大之季氏支持，「墮三都」理應成功可期。然而，或許因為季氏已無力控制城宰，又或者其意存觀望，在叔孫氏首先順利墮郕之後，公山不狃、叔孫輒以費叛而襲魯，幸虧孔子指揮若定而成功墮費，然已勞師動眾、備顯艱難；孟孫氏則因懼怕齊國來犯與意圖維護既得利益，導致「墮三都」功虧一簣。由此載錄，雖可見孔子實亦頗有武略，但更重要的是，《左氏》呈現了孔子與弟子在魯國意圖改革，然而終究功敗垂成的無奈與有心無力的困局。

有別於國內的艱難處境，國際外交上，孔子則有一展長才、意氣風發的機會。定十年齊魯二國的「夾谷之會」，顯現更多孔子的行事風格，《左傳》詳載其事云：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左傳正義》，卷 56，頁 2 上-4 上）

此則載錄包含四個事件，從中可分別觀察孔子的不同形象：一、盟會之前，由犁彌之言可見「孔丘知禮」當為時人共知，故齊國君臣聽聞孔子相禮，乃誤以為能以武力脅迫魯國。二、盟會過程中，齊國果教唆萊人「以兵劫魯侯」，由孔子面對突發的武力侵犯之即時處置與應對辭令，既維護魯定公之安危，又不忘顧及齊君尊嚴，可見其絕非「無勇」之輩，在「知禮」外，又呈顯有勇有謀的面相。三、關於盟辭內容的爭議，在齊魯漫長的紛爭中，魯國向為弱勢之一方，²⁹此次又遭武力脅迫，會盟壓力之大，可以想見；「汶陽之田」更是齊魯的是非之地，注家多指責「陽虎以鄆謹奔獻」，³⁰實際上早在宣、成年間，二國早已為此一夾於魯、衛、齊三國間的土地紛爭不斷，³¹在此背景下，孔子敢於盟會上藉由盟辭宣告魯國對「汶陽之田」的所有權，除針對當時陽虎之亂外，更應具有歷史意義，也具體呈現孔子之膽識。四、會盟後孔子婉拒齊侯之宴享，更可見孔子之敏銳判斷與善於辭令。所謂「齊、魯之故」，表面上說的是「舊好」，實際考察齊魯過往歷史，恐係「舊怨」為多，加上會盟時魯君險遭武力挾持，可知孔子婉拒齊君邀約，當是顧忌齊國可能另有所圖，不敢讓國君涉險，而其言論以德、禮為主旨，巧妙說服梁丘據，免除魯國再次的潛在危險，更顯謀略高卓。

孔子既如此善於辭令、進退有禮，復能周旋於大國之間，維護本國尊嚴與權益，此一「良臣」形象，在《左傳》中蓋僅鄭之子產可以相提並論。而綜觀先秦各類文獻，不僅《左傳》早已運用「仲尼曰」對子產大加推崇，《論語》亦載孔子稱子產為「惠人」、「有君子之道四焉」；³²近期出土的《清華簡三·良臣》綜述古今良臣，亦見孔子與子產並列：

魯哀公有季孫，有孔丘。……

²⁹ 哀十四年《左傳》載哀公言「魯為齊弱久矣」（《左傳正義》，卷 59，頁 19 上）可為明證。

³⁰ 如竹添光鴻云：「是時齊多侵魯田，且陽虎以鄆、謹奔獻，魯地愈削，故使反侵地。」（《左氏會箋》〔臺北：古亭書屋影印明治四十四年（1911）日本明治講學會重刊本，1969 年〕，卷 28，頁 22）

³¹ 可參拙作：《《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之〈三〉，其中論及鞏之戰後，晉國決定將「汶陽之田」予齊，即引發批評，乃至「失諸侯」，可見此一區域之爭議實廣為諸國所知，則茲事體大，不限於一時一人。

³² 分見《論語·憲問》（《論語注疏》，卷 14，頁 4 下）、《論語·公冶長》（《論語注疏》，卷 5，頁 7 下）。

鄭定公之相有子皮，有子產，有子大叔。³³

又《上博五·君子為禮》部分簡文，亦見孔門弟子與鄭人議論、比較孔子與子產：

行子人子羽問於子貢曰：「仲尼與吾子產孰賢？」

子貢曰：「夫子治十室之邑亦樂，治萬室之邦亦樂，然則【11】【11】壹
(喜—矣)。」

「與禹孰賢？」

子貢曰：「禹治天下之川，【15】□以為己名。夫【13】子治詩書，【16】
亦以己名，然則賢於禹也。」

「與舜【14】孰賢？」

子貢曰：「舜君天下，【12】……」³⁴

就孔子對子產的推崇觀之，當孔子身負相禮職務參與外交盟會時，子產的表現與作風，當為孔子所樂於效法；而就二人在《左傳》中具有類似描繪、《清華簡三》並列為「良臣」典範，以及《上博五》二人又被相提並論的現象觀之，先秦時期，孔子的「良臣」形象，或可略見一斑。

《左氏》對孔子行事的最後載述，則可見其尊崇與惋惜之情。事見哀十四年：

³³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157、158。

³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61。案：〈君子為禮〉一篇因頗有殘缺，全部簡文目前並未得出完整的編連，不過依據大部分學者的討論成果，大抵前九簡歸為一組，內容為顏淵與孔子討論君子行為如何有禮；第11至15簡則將仲尼與子產、禹、舜並列比較。實際之簡次編連綴合可參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2006年2月19日（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陳偉〈《君子為禮》9號簡的綴合問題〉，2006年3月6日（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劉洪濤〈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君子為禮》的拼合問題〉，2006年9月6日（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15）。又，關於孔子與「禹、舜」比較之議題，詳本文之〈三〉，並參考〔日〕淺野裕一：〈上海楚簡《君子為禮》與孔子素王說〉，收入氏著：《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臺北：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頁55-81。

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傳正義》，卷 59，頁 19）

事亦見《論語·憲問》。³⁵由哀公兩次發言，再次可見孔子身處的魯國政治環境：對外懼怕強勢的齊國，連國君都態度消極、缺乏自信；對內則三桓把持政柄，哀公不能，甚至也不想決策，一句「子告季孫」硬生生回絕了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的懇切請求。此一事件，再次具體而微顯示孔子重視君臣名分及力求實踐的核心理念，也再次呈現了孔子政治生涯面臨的種種無奈與無力。顧棟高曾論駁「感麟而作」說之不合理云：

蓋《春秋》之經，因是年請討陳恆之不行而絕筆也。夫《春秋》為天下之無王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生人之道絕矣！故不得已而作《春秋》，汲汲乎別嫌明微、正名定分。其用於魯也，則墮三都以張公室，待其歸老，季氏伐顛臾則誣，旅泰山則誣，口誅筆伐，猶望人心攝於大義而不敢肆。至十四年之四月，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六月行弑。孔子是時年七十一，沐浴請討，而魯之君臣哆然不應，則是人心死而天理絕，天下無復知篡弑之為非者。……是則《春秋》絕筆者，為大義之不復伸也，豈區區一物之微，而漫託于不可知之氣數哉？³⁶

姑且不論「獲麟」與《春秋》之「作」與「絕筆」是否有必然關係，單就《左傳》之敘事言，顧說確實點出《左傳》敘事的潛在意涵：在哀十四年「陳恆弑其君」之後，再無孔子行事之相關載述，僅有哀十五年孔子「聞衛亂」而發之簡短評論，

³⁵ 《論語·憲問》：「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論語注疏》，卷 14，頁 10 下-11 上）

³⁶ 〔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臺北：廣學社印書館影印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重雕山東尚志堂藏板，1975 年）〈春秋三傳異同表·春秋絕筆獲麟論〉，卷 42 之 4，頁 19。

³⁷隨後即是哀十六年孔子卒後，《左傳》借子贛之口為其發出的不平之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左傳正義》，卷 60，頁 2）

回顧前引各類孔子的政治作為與言行載錄，除夾谷之會短暫展現其知禮有勇、一展長才之丰采外，「生不能用」的主題，可謂貫串了《左傳》載錄孔子各種行事的敘事大旨；而魯國君臣於「禮」、「名」之兩失，不僅止於「誅孔丘」，也與前引諸多事件遙相呼應：季氏葬昭公墓道南、昭公夫人喪而不統，墮三都事件陪臣以下犯上，君主默然無措等，皆為「名不正」之惡果。

綜而言之，《左傳》呈現的孔子形象，一方面乃是後世熟悉的博文知禮、好學不倦的「老師」形象；所載某人師事、問禮於孔子，或孔子問學於某人等，皆屬此種形象之呈現；另一方面，則是將孔子描述為春秋時期的政治人物，既呈現其「良臣」面相，也真切展現了孔子的困境與無奈。有趣的是，以「孔子形象」在後世的發展言，《左傳》的兩種形象雖彼此相關，受重視的程度卻頗有落差：第一種形象，即所謂「博文知禮」，後世幾乎成為孔子最明顯的特質，但通觀《左傳》——除了關於「師承關係」的敘述確屬孔門獨有之載錄外——此種形象不論在內容比重或詳細程度上，可說皆非孔子專利。相對的，孔子做為政治人物的各種作為與相關史事，儘管在地下文獻大量出土的今日，仍尠有文獻能超越《左傳》記述之真切與細膩，但延續、討論此一論題者，後世卻屬少數；換言之，《左傳》載錄的孔子，其珍貴之處當屬敘述夾谷之會、墮三都、為魯司寇等種種作為，具體顯現孔子真實言行處事的「良臣」形象，此一形象至少在先秦時期對孔子的論述中，未見其他敘史文獻載錄更多細節。

³⁷ 哀十五年《左傳》載衛渾良夫之亂，孔子門人子羔、子路皆為衛孔悝家臣，子羔出而子路入，死於難。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左傳正義》，卷 59，頁 23 上-24 下）文長不錄。

(二)《國語》的孔子載錄及其「對問體」敘述模式

不同於《左傳》載述的孔子具有各種不同的型態與形象，《國語》不僅數量較少，型態也較單一：發揮評論作用的「孔子曰」僅有四章，且相當簡短，概皆作為所敘人物、事件之收束，較難考察具體的「孔子形象」，故暫不置論；³⁸以孔子為敘述核心的篇章，亦有四章，亦皆見於〈魯語下〉，且敘述模式近似，皆呈現某一特定形貌的孔子：如皆為身居高位者遭遇難解事物或異象，而後「問諸仲尼」，孔子則給予具體而明確的解答，展現其博學之材，如〈魯語下·季桓子穿井獲羊〉章：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罔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羶羊。」（《國語》，卷5，頁201）

所載相當單純，但見孔子回答季桓子之問，並講述所謂「木石之怪」、「水之怪」、「土之怪」，此外並無後續載錄，亦看不出此則載述除表現孔子之博物多聞外，是否尚有其他意義，又或載錄此事對季桓子有無褒貶之意。又，〈孔丘論大骨〉章載：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

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

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嶠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

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國語》，卷5，頁213）

「客」接連提出四個疑問，仲尼一一應答；不過其敘述略顯板滯，且近似上則，

³⁸ 四則皆見〈魯語下〉，且皆以「仲尼聞之曰」形式呈現。

並無太多前後文之鋪述，難以見出這些問答的意義；《史記·孔子世家》亦載錄此事，而於文末增「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³⁹云云，蓋即意圖說明此則載錄之意義。

上述篇章之外，《國語·魯語下》另二則類似的載錄則較有可說，〈孔丘論楛矢〉章載：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國語》，卷5，頁214-215）

仲尼以頗長的篇幅論述關於「武王克商」與「肅慎氏」的一段古史，以此解釋「楛矢其長尺有咫」的來歷。其基本形式與上引二例無異，皆具有對問特徵；值得注意的是首句「仲尼在陳」，亦即不同於其他數則孔子在魯的言論或與魯國君臣的問答，本則乃記述孔子在陳的言論。就《國語》之文獻特質言，既稱〈魯語〉，則所收宜為魯國君臣之語，若有涉及他國者，多為本國使者出使他國，或於本國評論他國之事，較少見某人已於他國出仕，而猶載其言論以為本國之語者。由此或許可說，《國語·魯語下》有重視孔子言論的傾向，故孔子雖已身處異國，所論對象與內容也與魯國時事無關，而仍收錄其語；只不過其所重視的孔子，似乎僅限於展現其博學多聞，而較少關乎政治活動的載錄，也未見如《左傳》關於孔門師承的記述。

另一則關於孔子的言論，《國語》恰與《左傳》互見，可供比較二書敘事傾向之差異。〈孔丘非難季康子以田賦〉章載：

³⁹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47，頁23。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國語》，卷5，頁218）

此則載錄以季康子問田賦事引出仲尼的言論，雖然季康子與仲尼並未直接對話，但孔子先以「不對」顯示不願與季康子共事或提供意見，而復以「私於冉有」的私人／師生對話形式，表明對此事的批判，闡述了關於「先王」對土地與養民的觀念，並直接批評季康子若真欲循禮行事，何不遵周公之法；若欲恣意妄為，何必惺惺作態，顯然還是傳達了自身立場予季康子。整體而言，本則載錄的重點在紀錄孔子的言論，沒有對相關事件的前因、後續多加著墨。

幾近相同的載錄，《左傳》的敘事性遠為豐富，哀十一年載：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氏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左傳正義》，卷58，頁27下-28上）

《左傳》與《國語》最明顯的不同，在中間段落敘述了季氏與孔子的互動：「三發」表明在孔子推辭之後，季康子仍執意要孔子表態；而「卒曰」云云，雖將孔子推崇為「國老」，但語氣盡是質問霸道之態，按理不會是冉有對業師所發，當為季康子所言，或命冉有轉述。由此段敘述，可再次呼應上小節提及孔子在魯的處境：一方面被尊為「國老」與善禮之人，卻在季氏的專擅之下無法發揮所長、實踐所學，而只能以消極的方式勉力維護自身認同的價值觀。另一不同處，則是《左傳》於孔子言論之後，加以「弗聽」二字作結，補充了此一事件的簡單結果。孔子之言雖是「私於冉有」，此處之「弗聽」卻不會是冉有拒絕老師的教誨，而應解作季

氏間接聽聞孔子勸說，而仍執意不願接受；換言之，《左氏》的載述，不同於《國語》傾向以記錄言論為主，記言之外，也不忘照應孔子與季氏的互動與事件的完整。

透過上述分析，可有幾個簡單結論：一、《國語》因其性質傾向以記錄言論為主，對「事件」的敘述往往較為簡略。二、《國語》的孔子形象，因其言論內容之故，較為接近《左傳》「博物君子」的形貌；然因相關敘事較少，形象也較單一。三、考察其言論內容，除可與《左傳》互見的一則外，大都為闡述古史逸聞、講解怪物與異象，雖尚不足以稱為《論語》所謂的「怪力亂神」，⁴⁰然究非吾人所熟悉講「仁」論「禮」的孔子形象。

《國語》孔子形象的特色，值得深入思考：當孔子「博學」的形象與「老師」的身分廣泛為人傳頌與聽聞時，固然會有孔門弟子問道求禮，從師於孔子；同時似乎可以想見，沿此傾向，也很可能出現一些好事之人，或欲利用孔子之聲名、或盲目崇拜以為仲尼無所不知，又或者是不問蒼生問鬼神的昏庸政客，以各種奇怪物象、災祥軼聞求教於孔子。不論孔子是否真如〈魯語下〉所載如此詳盡的回答各種怪奇之問，此一「問答」模式，與「孔子身分／形象」所代表的特殊意義，無疑可以承載非常寬廣的內容。這或許也說明了何以目前所見之戰國諸子與出土文獻，與孔子相關的載錄往常見「問答」模式，並由此引出各種孔子之語的敘述型態。下節將分析傳世之戰國諸子與新近出土文獻具有代表性的孔子載錄。

三、出土文獻與先秦諸子的孔子形象及其表現形式

本節分別探討儒、墨、道、法等戰國學派⁴¹對孔子的載述與特色。此類文獻雖包含傳世與出土諸多典籍，然大抵具有以下共同特色：一、對問的敘述模式。二、重視言論的傾向。三、孔子「博聞知禮」的形象。四、對孔子地位的認識。在這些共同基礎上，隨著學派立場的不同，「孔子形象」復產生不同向度的演變。由於材料眾多、議題多元，以下僅舉與「孔子形象」較為相關，或較具特色的段落略加述論，其更細緻、全面的分析，則期諸來者。

⁴⁰ 《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注疏》，卷7，頁7上）

⁴¹ 戰國時期除「儒家」外，未必有「學派」之名，茲姑依後世觀念稱之，讀者察之。

(一) 出土文獻的「孔子形象」

透過《左傳》、《國語》等載錄，可以推測孔子在世之時，其地位已頗受重視，雖未至後世「聖人」、「宗師」的起步，但正如《左傳》刻意記載孔門師承與時人對孔子的評價，《國語》也收錄數則孔子之語，可間接推知孔子的地位與評價，相較於時賢君子如子產、叔向，應不遜色。

隨著戰國時代的到來與諸子的興起，孔門學人雖開枝散葉，然必以孔子為宗，可想而知其講學內容與形式也必與「稱述師說」密切相關，是以不論傳世或出土文獻，儒家文獻中以孔子與弟子或為政者之「問答」作為論述框架者，堪稱不計其數。單就出土文獻言，其中儒家文獻提及孔子者，幾無不以「師弟對問」的框架開展論述。礙於篇幅，無法一一徵引，然透過以下簡表統計，猶可略見其梗概：

出土文獻、篇名	人物	內容	與傳世文獻相應篇章	備註
《郭店楚簡·窮達以時》	(孔子、子路)	孔子困於陳蔡	《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在厄》、《韓詩外傳》、《說苑·雜言》	僅存推測為孔子所發的「言論」段落，篇中無人名
《上博二·民之父母》	孔子、子夏	子夏問孔子為政者何以為「民之父母」，並詢問「五至」、「三無」之意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家語·論禮》	以一問一答為主，無敘事段落
《上博二·子羔》	孔子、子羔	孔子與子羔談論上古帝王	無	以一問一答為主，無敘事段落
《上博二·魯邦大旱》	魯哀公、孔子、子贛	魯哀公遇大旱而問於孔子，孔子說以刑德之治；其後孔子又與子贛討論禦旱之道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然背景在齊國	以一問一答為主，然孔子分別與魯哀公、子贛論禦旱，稍有事件轉折

《上博三·仲弓》	孔子、仲弓	仲弓與孔子討論為政之道	無	背景為「仲弓為季氏宰」，以對話問答為主，無敘事段落
《上博四·相邦之道》	孔子、(魯哀公)、子貢	孔子與魯哀公、子貢討論為政之道。內容不全	無	以一問一答為主，無敘事段落
《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	孔子、季庚子	孔子與季庚子討論為政、養民、用刑等道理	無	背景為「季康子以幣迎孔子歸魯」，以對話問答為主，無敘事段落
《上博五·君子為禮》	孔子、顏淵、子羽、子貢	前半段載顏淵與孔子論禮；後半段則載子羽與子貢比較、討論孔子與古今賢人	「顏淵與孔子」之問答主題甚多，可參考《上博八·顏淵問於孔子》之〈附錄〉	以一問一答為主，無敘事段落
《上博五·弟子問》	孔子、宰我、顏淵、子貢、子游	載孔子與多位弟子問答之語	部分內容頗能與《論語》呼應	以一問一答為主，無敘事段落
《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	孔子、季桓子	孔子與季桓子討論「二道」與「興魯」等問題	本篇整理者附錄有孔子與季桓子相關事跡繫年，可資參考	以一問一答為主，無敘事段落
《上博八·子道餓》	(孔子)、言游	疑與「孔子厄於陳蔡」一事相關。或以為與孔	本篇整理者附錄有孔子絕糧於陳蔡之相關事件，可資參考	敘事段落較豐富，然全篇並無提及孔子之

⁴² 參考復旦、吉林大學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子道餓〉校讀〉，復旦大學出土

		子無關 ⁴²		名，難以確認是否以孔子為敘述主題
《上博八·顏淵問於孔子》	孔子、顏淵	顏淵與孔子討論「君子之內事」、「君子之內教」、「至明」等議題	本篇整理者附錄有孔子、顏淵對話資料，可資參考	以一問一答為主，無敘事段落
《上博九·史蒞問於夫子》	史蒞、「夫子」	史蒞與「夫子」討論「敬」與「強」等觀念。全篇未見「孔子」一詞，而均稱「夫子」，此「夫子」是否即是「孔子」，或仍有討論空間	無	以一問一答為主，無敘事段落
《清華簡三·良臣》	子產、孔子等人	提及「魯哀公有季孫，有孔丘」，將孔子列為古今良臣之一	無	以條列人物為主，無敘事段落

由上表可知，除去〈良臣〉的條列歷史人物、〈子道餓〉的內容有所疑慮外，大部分的儒家出土文獻，都以「對問」發端，進而論述特定議題或學說概念；孔子的對話對象多為弟子，其次則為少數孔子當時可能見到的為政者。此一「對問」體制，雖未對孔子做出直接的描繪，卻說明了孔子的「老師」形象早已深植人心且影響廣泛。

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1，2011年7月17日。陳劍：〈上博八〈子道餓〉補說〉，收入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434-438。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表「備註」之整理，出土文獻之「孔子記事」概皆重在「言論」，尠少「敘事」，故而「孔子形象」亦相對模糊，少有可論者。

（二）儒墨二家對孔子地位的爭議

相較於出土文獻，傳世儒家文獻如《孟子》、《荀子》，對孔子形象的描繪還是較多的，即連反對儒家的墨子學派，其書中也有部分對孔子行事的敘寫。以下略述儒墨二家對孔子形象與地位的高下之爭：

就時代先後言，《墨子》是先秦諸子中相對較早的文獻，其關於孔子的載錄，頗有直接的批評與負面的形象，如〈非儒下〉：

孔某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糲。十日，子路為烹豚，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

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某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

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則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⁴³

其運用、結合「厄於陳蔡」與「孔子仕魯」二事蹟，甚至化用《論語》內容，將孔子形塑為標準不一、言行不符之人，甚至批判其為「汙邪詐偽」；該篇尚有許多段落將孔子形塑為善於權謀之人，認為孔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⁴⁴此類描述不僅誇大，且幾與《論語》中強調「君君臣臣」的孔子形象截然相反，當是墨家「非儒」的極端表現。另外，〈公孟〉篇提出孔子不足以稱「聖人」、⁴⁵〈耕柱〉篇則引錄孔子與葉公子高的對話，而以「子墨子聞

⁴³ [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75-277。

⁴⁴ 同前註，頁271。

⁴⁵ 《墨子·公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墨子閒詁》，頁416）

之」評論孔子所言之不當。⁴⁶不過，《墨子》仍有部分認同孔子之說，〈公孟〉篇有一較為持平的載錄：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烏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⁴⁷

由這些對孔子的批評，可大略掌握孔子形象發展的幾個面向：首先，「老師」的形象可謂確立不移，即使遭受墨子批評，孔子與弟子論學或為政者向孔子請教、問政的情節仍是不變的母題。其次，孔子是否可稱「聖人」／「聖王」的爭議。《左傳》、《國語》幾乎不見時人以孔子為聖人的論述，且當時的「聖人」可能僅指較為聰明、博學之人而已；到了《墨子》，「聖王」顯然具有較為崇高、德位兼具的意義，也因此出現了孔子地位是否如此崇高的爭議。復次，孔子的學說影響力逐漸展現，暫且不論〈非儒〉中過於極端的負面形象描繪，墨子雖非儒，但論辯時仍稱引孔子，甚至承認孔子之學有「當而不可易者」；不過墨子著重、攻擊的是孔子之「學說」，孔子實際的為政與行事——「良臣」／政治家的一面——則似乎並非《墨子》關注的焦點。

相較於《墨子》之極力貶抑孔子，塑造其負面形象，「拒陽墨」的孟子自然持相反立場，極力稱揚孔子。綜觀《孟子》書與孔子相關的段落，單就主題與運用類型、文體言，皆遠較《墨子》豐富許多，如：一、與《左》、《國》相似，稱引「孔子曰」作為評論、說理之論據；二、與出土文獻類似，長篇載錄孔子與弟子的問答，借以闡述某一主題或道理；三、舉孔子與弟子事蹟為例，說明禮制或有關《論語》載錄的文句，甚至有孟子與弟子討論、辯證，回應各種對孔子的質疑；四、最具特色者，當推盛稱孔子「作春秋」事蹟，將其與古聖賢王同列的

⁴⁶ 《墨子·耕柱》：「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以所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所以對也。』」（《墨子閒詁》，頁 394）

⁴⁷ 《墨子閒詁》，頁 422。

論述。前二者與一般儒家文獻稱述孔子的類型大體相似，後二者，則堪稱《孟子》著力最深者。茲僅就後二者分別舉例說明之：

關於探討、辯證孔子行事者，如〈告子下〉：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注疏》，卷12上，頁11上）

此則辯證「孔子去魯」事，特別說明「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強調孔子行事表面易遭誤會，實際上仍堅守其「重禮」之原則。此類論述，可能即是針對如上文墨家誇大／醜化孔子行事，塑造其負面形象的論述，特別就某些容易產生歧異與誤會之事加以說明。又如〈萬章下〉：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

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注疏》，卷10下，頁1下-2下）

此章討論君子如何把握「交際」之道，萬章分別提出「受尊者禮」、「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餽也以禮」、「諸侯取之於民猶禦也」等情境，探問「君子」如何在「恭敬為禮」與「守道不阿」間尋求適當的分際，孟子則一一回答，並以「孔子獵較」為例，說明即若孔子，如果「仕於衰世」，也須有一定程度的隨俗從眾，「不可卒

暴改戾，故以漸正之」。⁴⁸此一陳述，基本上與上節《左傳》敘事揭示的孔子之政治處境相符；萬章則進一步追問，然則孔子何以不選擇「去而不仕」，孟子則列舉孔子仕於魯、衛的不同事蹟，說明孔子考量不同的情境，出仕於不同國家。暫且不論孟子所舉孔子事蹟是否都信而可徵，由此一對話雙方的立場觀之，萬章提出的問題不免對孔子有所懷疑，而孟子則一再為孔子解釋、辯護。

除辯證行事外，孟子對孔子的最高推崇，體現在「作春秋」與「聖人」兩個議題上。《孟子》書以孔子為「聖人」，乃至與古聖賢並列的論述甚多，如〈公孫丑上〉：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注疏》，卷3上，頁10下-12上）

文中論孔子、伯夷、伊尹行事之異，三人相提並論；又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言，稱孔子為「聖人」、「賢於堯舜」。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出土之《上博五·君子為禮》後段，亦載錄孔門弟子以孔子與「禹、舜」相較，⁴⁹此一現象涉及孔子地位的抬升與「素王說」的雛形，淺野裕一〈上海楚簡《君子為禮》與孔子素王說〉已有相當詳細的分析與比較，茲不複述。

關於孔子「作春秋」事，則為《孟子》一再強調的盛事，〈滕文公下〉載：

⁴⁸ 語見趙岐《注》，《孟子注疏》，卷10下，頁2下。

⁴⁹ 引文已見〈二〉之（一·2）。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注疏》，卷6下，頁4下-5上）

〈離婁下〉亦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注疏》，卷8上，頁12上）

《孟子》是先秦文獻中率先提出「孔子作春秋」議題者，其重要性自不容忽視。若說討論孔子之為政與行事，乃至將孔子與古聖賢王相較、並列，是由歷史面向抬昇孔子的政治地位與影響力；則「作春秋」的強調，乃由學說、理論層面，形塑孔子為「學術」之聖人，並以此達到孔子傳承文王、周公之王道的學派目的。可以推想，當孟子之世，其立論必須符合兩種向度之需求：就學說內部言，以孔子為自身學理之依據與來源；就對外論辯言，亦須正面迎擊不同學派的質疑與挑戰。前者，主要體現在稱述「孔子曰」或孔子行事，作為評論、說理之論據；詳細論述孔子事蹟或師弟對話，說明禮制或有關《論語》載錄之文句者，亦屬此一目的。後者則體現在上文所舉辯證孔子行事的章節，可說是為了確立孔子做為學說來源之正當與合理性，反駁各種可能的質疑，故加以澄清、析辨。而此二方向之論述目的，實際上又相輔相成：藉由駁斥、釐清各種質疑，論證孔子學術、政治地位的不可動搖；確定孔子地位之後，自身學說既出自孔子，則自然如虎添翼，在各種論辯上更顯有力。「作春秋」的事蹟、將孔子與古聖賢王同列，可說即是孟子推崇孔子學術理路與論辨方法的最高體現。

相對於孟子須與楊朱、墨翟爭論孔子的地位，較晚的荀子對孔子的敘述又有不同的開展。綜觀《荀子》的孔子載述，辯證孔子行事者較少，而多為引述「孔子曰」或記敘孔門師弟之對問。值得注意的特色有二：首先，《荀子》往往「仲尼、子弓」並稱，這是其他儒家文獻少見的現象：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非相〉）⁵⁰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
 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
 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
 （〈非十二子〉）⁵¹

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
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儒效〉）⁵²

此或牽涉儒家學派之別，目前仍無法確知「仲尼、子弓」之學術源流如何、影響力大小。然而，由這些論述可見，《荀子》書中以「仲尼、子弓」與堯舜、文王、周公並列，推舉為儒者之最高典範，又較少如《孟子》汲汲維護、辯駁孔子之地位與事蹟的論辯，則或許可有兩種推測：一、《荀子》書針對的讀者，蓋以其自身學派為主。孔子在儒家學派的地位本已無可動搖，自無需多加辯護或討論；二、荀子之時，孔子的地位已大致獲得承認與確立，則面對其他學派挑戰時，已較不致成為攻擊的弱點。

其次，若說孟子最重視的孔子事蹟，在「作春秋」，則荀子最重視、敘述性也最強的孔子事蹟，則多與「禮」、「法」相關。首先，包含多種引用「孔子曰」以說明「禮」的論述，同時也頗有以「禮」為主題的孔子行事載錄，如〈子道〉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⁵³

⁵⁰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73。楊倞《注》：「子弓，蓋仲弓也。」

⁵¹ 同前註，頁96-97。

⁵² 同前註，頁138。

⁵³ 同前註，頁531。

〈子道〉多記孔子與弟子之互動，以見孔子之言行；〈哀公〉篇則載錄孔子與哀公的種種問答，通常魯哀公均頻頻稱「善」，凸顯孔子的影響力。這些載錄，或記敘孔子就禮、仁、知等觀念或準則論述，或記孔子與弟子、為政者的互動，顯示其對禮儀分際之掌握，同時也強調了其「老師」，甚至是「王者師」的形象。⁵⁴

《荀子》書中的孔子載述，最為著名，也最為特別的當推「孔子誅少正卯」事，見〈宥坐〉篇：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也。」⁵⁵

「孔子誅少正卯」，最先出現於《荀子》，歷代討論相當豐富，茲不一一詳述。⁵⁶整體而言，此則載錄表現出《荀子》的孔子形象有別於其他儒家文獻的幾個重要特色：一、《荀子》載述孔子行事，而以「為魯攝相」或「為司寇」⁵⁷等為背景者，可說較為特殊。因為在《墨子》與《孟子》中，提及孔子為官出仕者，皆在說明孔子「為何去魯」，而非講述其任職時事；二、承前所言，此文記孔子「為魯攝相」，強調孔子秉持君子之道端正朝綱，發揮上行下效的影響力，然而同時也涉及孔子對刑、法的態度，此一「誅殺」之舉，自然引發種種質疑。夏長樸先生認為此一載述或與法家思想興起，或者荀學轉向法家的現象有關：

⁵⁴ 文長不具引，參同前註，頁 537-547。

⁵⁵ 同前註，頁 520-521。

⁵⁶ 可參夏長樸先生：〈子為政焉用殺——論孔子誅少正卯〉，《臺大中文學報》第 10 期（1998 年 5 月），頁 55-80，收入《儒家與儒學探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4 年）。文中詳盡分析、詮釋此事之歷代論述與當代意義。

⁵⁷ 見〈儒效〉、〈宥坐〉等篇。

具有法家色彩或已經成為法家學者的荀子後學，為增加說服力，提升一己言論的正當性，按往舊造說，炮製出「孔子誅少正卯」事件，以遂行己私，雖不能說順理成章，但卻是相當可能的。⁵⁸

此一推斷確能與荀子「隆禮重法」的思想連結，荀子之「法」，乃根植於德禮兼通的君子，而孔子既為荀子認定的理想儒者典範，甚至已獲當世諸家認同，則以孔子為例證增強己說，確實有可能產生「孔子誅少正卯」的敘述。

綜上所述，透過墨家與時代略有差異的孟、荀二儒家學派，可以發現孔子的形象因應時代與學派論述重心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偏重：《墨子》因反對儒家，故刻意形塑孔子言行不一、虛偽矯作的形象；《孟子》為了反擊論敵與建立學說根基，不惜長篇討論、辯證孔子行事，不但力挽孔子形象於「聖賢」一方，甚至將其推崇至幾近「素王」的地位；到了時代較晚的《荀子》，孔子的地位似乎已獲公認，與文王、周公相提並論也成常態，辯證或釐清其事蹟不再是首要之務，如《孟子》「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等崇美至極的言詞也較少出現，《荀子》轉而形塑孔子能夠「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⁵⁹的風範，將其形象轉為能影響執政者與人民，既能教學又具有一定政務能力的「大儒」，其中當亦不無荀子自身思想與理念的投射。

（三）道法二家對孔子形象的變創

如上所述，先秦諸子對孔子的形象、地位，因學派與時代之不同，而有不一的論述與評價。不過儒、墨二家對孔子的記述，相對而言仍屬平實，甚或可與史傳參照。道、法二家則對孔子形象有了不同面相的發揮與變創。由於素材眾多，茲以《韓非子》、《莊子》為代表，略論道、法二家論述中的孔子形象。

《韓非子》對孔子並未如墨家般予以嚴詞批判，⁶⁰反而對孔子言行有相當多的

⁵⁸ 夏長樸：〈子為政馬用殺——論孔子誅少正卯〉，《儒家與儒學探究》，頁 118。

⁵⁹ 《荀子·儒效》：「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荀子集解》，頁 118-120）

⁶⁰ 僅在〈難一〉、〈難二〉等較為特殊的篇章中，有數則先稱述某事件與仲尼之論評，再加以另一論難駁斥仲尼所下之評論，以刻意「難」孔子之說；不過此二篇內容主要似乎用

載述，甚至在《五蠹》篇稱孔子為「天下聖人」。⁶¹換言之，《韓非子》對孔子至少在某些時候是推崇的；又或者儘管並不認同孔子之言行或學說，但仍將孔子事蹟視為具有相當論說效力的論資。⁶²大體而言，其運用孔子作為論述之資，約有二種面向：一、敘述的雖是孔子故事，但代入法家精神，如〈內儲說上〉：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趣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⁶³

文中仲尼不但受哀公倚重，且諫言「行罰」，可說與《左》、《國》敘事的「生不能用」、儒家強調的博文好禮全然相反，凡此，蓋韓非借用孔子講述自身之概念，恐非孔子本來面目。二、敘述孔子受人忌妒而不能用，如〈說林上〉：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

於展現、練習「論難」之法。

⁶¹ 《韓非子·五蠹》：「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願為君。」（張覺：《韓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9，頁1206-1207）

⁶² 如〈顯學〉稱：「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韓非子校疏》，卷19，頁1244）主張即使聰明賢智如孔子，亦有視人不明之時，可說一方面承認「仲尼之智」且引用《論語》，一方面亦運用其事作為反例，以此警戒「世主」。

⁶³ 《韓非子校疏》，卷9，頁604-605。

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
太宰因弗復見也。⁶⁴

所謂「子圍恐孔子貴於君」而刻意離間，顯是戰國時期策士間相互競爭、求取國君重用始出現的現象。對於春秋時期的孔子而言，一則其受重用僅限於魯國，且為期甚短，一則當時士人之競爭尚未如此激烈，理當不致如《韓非子》所述。

《韓非子》形塑的孔子，還維持在一定的事實框架內——如與魯哀公或弟子問答、對話，奔走諸侯間求用，厄於陳、蔡等——只是在此類基本事實下，添換屬於自身學說的內容；道家文獻對孔子形象的塑造，幾可謂打破了框架的侷限，有了更恣肆奔放的發揮。以下就《莊子》所載孔子形象之特色略作述論。

前賢論述《莊子》中的孔子，成果頗豐，據筆者粗略蒐羅，已有數十家；尤以王師叔岷〈論莊子所了解的孔子〉，⁶⁵由多方面闡釋《莊子》開闢了儒家典籍中的孔子形象，認為「莊子了解孔子，在儒家者流了解孔子之上」；同仁徐聖心先生〈《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⁶⁶則分為八個面向，詳細爬梳歷代莊學之尊孔、抑孔實況。筆者另有〈《莊》、《列》書中的「孔子形象」論之〉，⁶⁷茲僅扼要述論，讀者察之。⁶⁸

首先，不論《墨子》、《孟》、《荀》與《韓非子》、甚或出土文獻，孔子的對話與互動對象，皆以魯國君臣、孔門弟子為主，他如葉公子高、衛靈公等，也都是與孔子同時、有文獻可徵的實存人物；但在《莊子》中，與孔子對話的對象則多元紛呈、亦真亦幻、時儒時道。最為知名的即是大量與「老聃」的對話與互動，此外還有楚狂接輿、王骀、叔山无趾、承蜩之痾僂者、大公任、子桑雎、溫伯雪子、盜跖、漁父等等，都不讓孔門弟子專美於前，而與孔子有種種論辯或往來，這些人物均尠少見於史冊或其他子書，很可能是《莊子》學派想像力的發揮或寓言寄託的產物。

⁶⁴ 同前註，卷7，頁452。

⁶⁵ 收入《慕廬雜稿》（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

⁶⁶ 文載《臺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2年12月）。

⁶⁷ 於「北大臺大中國古典文學與文獻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2014年11月21-22日）宣讀。

⁶⁸ 歷代「莊子學」之研究，當推方勇《莊子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最為詳贍，第三冊末更附有「一百年來莊子研究論文輯目」230餘頁。

其次，在前述諸子書中，孔子的「老師」形象可謂確立不移，且有越來越崇高的趨勢，從單純的師弟對問，到為政者求教、問政於孔子並採納其意見，孔子的形象從「人師」發展至於「王者師」，諸子透過「對問」的模式，給孔子很大的發言空間，闡述各種理念；同時在敘史文獻中，孔子「博物多聞」的形象，也使其往往呈現「解答者」、「評論者」的角色；但在《莊子》中，此一形象與對問角色，同樣被顛覆，有不少載錄，孔子成為「對問」模式中的「聽話者」而非闡述的一方，如〈大宗師〉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⁶⁹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⁷⁰

此段載錄可分為三段：前二段孔子仍保存「老師」形象，指點顏回「可矣，猶未也」；第三段則呈現對顏回的「坐忘」感到驚奇、不解，轉而問於顏回，顏回則論述何謂「坐忘」云云。文中的孔子成為一個求教者而非老師，甚至說「丘也請從而後也」，此堪稱《莊子》對既有的「孔門師弟對問」模式做出的一種翻轉與諧

⁶⁹ 王師叔岷曰：「案：《淮南·道應篇》『仁義』二字與『禮樂』二字互錯。審文意，當從之。《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本書〈知北遊篇〉亦有此文）《淮南·本經篇》：『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偽《文子·下德篇》亦有此文）道家以禮樂為仁義之次。禮樂，外也；仁義，內也。忘外以及內，以至於坐忘。若先言忘仁義，則乖厥旨矣。」見《莊子校釋》（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26，1972 年），卷 1，頁 61 下-62 上；亦見《莊子校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88，1988 年），頁 268。

⁷⁰ [清]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282-285。

擬 (parody)。⁷¹

復次，不論《左》、《國》，或儒、墨諸子所載，對孔子「博物多聞」形象，通常呈現正面稱許；《莊子》書中，孔子的「飽學多識」卻常成為批判或嘲弄的重點，如〈天運〉篇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鈞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其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⁷²

雖然〈天運〉的成書時代頗有爭議，尤其出現「六經」之名，不少學者懷疑未必出於戰國，不過此處仍可看出莊子學派之立場：其刻意針對孔子最為知名的「博學」形象，而以「老聃」之語加以論駁，認為孔子的知識乃「先王之陳迹」，若徒然侷限於過往知識的講求，將無法觸及生生不已、變化無窮的性命之道。⁷³

雖然孔子形貌在《莊子》中堪稱變化莫測，但就敘事之發展言，諸子書散見的各種孔子事蹟，如厄於陳、蔡，於魯為官等，在《莊子》似有漸次整合為編年序列的傾向，如〈山木〉載：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⁷⁴

〈讓王〉亦載：

⁷¹ 《莊子》或揚孔或抑孔，對老子亦然，蓋皆欲破除「聖迹」之執著，此意叔岷師多有發揮，說可參《莊子校詮》。

⁷² 《莊子集釋》，頁 531-532。

⁷³ 〈養生主〉開篇即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莊子集釋》，頁 115）亦為此意，皆欲破除對知識之執著。

⁷⁴ 《莊子集釋》，頁 684。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⁷⁵

此二篇與上述之〈天運〉，皆有成書時代較晚的爭議。即使如此，更可看出孔子形象發展的傾向：從個別事件或小段語錄的傳講，可能因數量逐漸增多、對其人日漸重視，而開始出現歸納、統整的論述。此處借用他人之口，對孔子周遊列國的事蹟做出概述，姑不論其所述是否符合史實，此一現象至少顯示出，孔子不僅地位普遍獲得認識與尊重，其事蹟也逐漸傳佈，並可能略有編次、序列的傾向。

透過上述簡略的舉例，可以發現儘管孔子的某些形象在戰國諸子的時代似乎已然成型，如：博聞、老師、地位可與聖王並列等；「孔子論述」也大體有一定模式，如「師弟對問」之體裁、以「孔子曰」／「仲尼曰」作為評論等。但諸子各家，因學說、論述目的之不同，仍在這些既定模式中，變創出不同的孔子形象與論述，在道、法此二明顯不同於儒家的學派中，創發性尤為明顯。在《韓非子》中，可以看到建議「用刑」的孔子，比《荀子》寫「誅少正卯」而猶以君子之德為說，更進一步直接借用孔子講述法家思想，運用孔子的地位增添自身學說的說服力。在《莊子》中，則可見到對既定論述模式的顛覆，對人物關係的重新詮釋等；然而正因刻意顛覆與變創、化用，間接說明、印證了孔子的地位與形象在戰國之世實已獲得普遍的認識與確立。

整體而言，諸子文獻中，孔子的「老師」形象，較之《左傳》、《國語》獲得大幅度的強調與提升，大量的「師弟對問」載錄即是明證；而「聖賢」形象，則可能隨著儒家學派的辯論所須而開始被強調，隨後漸獲共識，然而也引來不少質疑與調侃；相對的，孔子的「良臣」形象與政治作為，則幾乎不為諸子所重視，僅《荀子》與《韓非子》稍有述及孔子「為政」之情事，或孔子如何遭忌而喪失從政機會，不過這些事蹟也不無戰國士人的自我投射，或刻意運用孔子故事講述自身學說。這或許因為對講求「得君行道」的戰國諸子而言，孔子一生中發揮實際政治影響力的事件實在不多，同時也並未直接得到國君重用，則其作為「良臣」

⁷⁵ 同前註，頁 981。又「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類似語句，亦見〈天運〉、〈漁父〉等篇。

的少數事蹟與貢獻，對戰國諸子而言，不論對於相互論辯或勸說國君，其發揮的修辭效用或說服力均相對有限，故而較少提及此一面相。

四、《史記》的孔子敘事

透過前二節的論述，大體可見先秦時期多元紛呈的「孔子形象」，也約略可見某些趨勢與傾向。降及漢代，在政治、學術都趨向大一統的局勢下，對孔子的評價與詮釋，也似乎產生相應的發展。本節以《史記》為主，參較《公羊》、《穀梁》、《左氏》三《傳》的孔子相關載述，嘗試分析在漢代「經學」學術背景下，史家對孔子的詮釋面向。

關於《史記》〈孔子世家〉與〈仲尼弟子列傳〉，歷代多所討論、辨析，誠如伍振勳先生的統整：

漢、唐學者並未在「事理」層次質疑《史記》所敘之「事」非實、所論之「理」非真，而是在「義理」層次質疑司馬遷的「歷史敘事」有違儒學核心价值。……直到宋、明學者，由於經學典範已經轉移，終於提出嚴厲的質疑：司馬遷真知孔子嗎？……宋、明學者對〈世家〉的質疑，主要在「聖人敘事」與「經學道統」互為表裡的義理層面，至於從傳記層面要求考辨〈世家〉的「孔子傳記」，並具以詮評其「聖人敘事」的真確與否，則尚未顯題化。⁷⁶

對史遷的質疑確實始乎宋明，但一直要到清儒崔述開始，所謂「從傳記層面要求考辨」的史實考證命題才蔚然成風且影響至今。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或許正因孔子長期以來對中國學術思潮——不論正面或負面——皆影響甚鉅，則歷代學者不論從何種進路探討「聖人敘事」或〈孔子世家〉，實際上或多或少都有其必須回應、處理的當代學術、政治、倫理，甚或社會議題，故而總不免將《史記·孔子世家》置於自身的學術脈絡中詮解、批判，即便如強調追求「客觀史實」的古史辨學派，其對「孔子敘事」用力最深者，仍在破除其「聖人」地位，實仍帶有其當代的學術或政治目的。誠所謂「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如此一來，反而忽

⁷⁶ 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頁 228-229。

略了「孔子敘事」本身的發展軌跡，亦即其如何由先秦文獻紛呈的載述，一路因革損益，發展至漢初〈孔子世家〉的歷史敘事發展脈絡。換言之，同為以孔子為主的敘事內容，長期以來為各家各派、各種體裁所載述、呈現，必然有其發展的歷史軌跡，諸如形象的變化、事蹟的增減、地位的升降等，此實為值得深入探析的論題。故下文將聚焦於《史記·孔子世家》如何承繼先秦以降之孔子敘事傳統與成果，而在漢代的學術風氣下，又有何呼應當代學術風氣的變創與觀點。

（一）〈孔子世家〉敘事體式的融裁與變創

綜觀先秦至漢初「孔子敘事」的發展軌跡，《史記》對孔子的敘述，最大的變創首在敘事體式，亦即史遷統合先秦經、史、子載述的各類孔子事蹟，將各種缺乏背景或歷史脈絡的個別事件，置於編年的時間軸，並將各種來源不一的事件重新進行「脈絡化」。

〈孔子世家〉以編年為經，以孔子行事為緯，採摭《論語》、《左傳》、《國語》、《公羊》、《穀梁》，乃至諸子書所載，將個別而分散的史事統合在孔子一生的行蹟之中，尤其《論語》中各條單獨載錄、缺乏背景的語錄，〈孔子世家〉往往賦予相關的歷史脈絡或事件背景，如孔子在衛事：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史記會注考證》，卷47，頁64-65）

此則敘事揉合《論語·子路》之第三章與第五章。此二章在〈子路〉篇個別獨立，並無必然的連結或明確的歷史背景，《史記》卻先以〈子路〉篇第五章「魯衛之政」，解釋、呼應孔子「自楚反乎衛」的行蹟，復補充衛出公蒯瞶父子爭國的歷史，

⁷⁷說明「衛君欲得孔子為政」的背景，以此轉入〈子路〉篇第三章「衛君待子而為政」的討論，巧妙的將原本「語錄」之體，透過敘事脈絡，衍寫為「言事兼備」的孔子之傳。又如〈世家〉載公山不狃召孔子事：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史記會注考證》，卷47，頁24-25）

此則原出《論語·陽貨》，⁷⁸歷來爭議甚眾，司馬遷以「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解釋孔子欲應不狃之召，嘗試將《論語》孤立的短語與簡要的事件，結合為立場大體一致、情節富於承轉的人物傳記。

透過上述簡單的舉例，可見司馬遷堪稱首位大規模統整各類孔子載述的史家，並將其分類、整理，且重新進行「脈絡化」，賦予每個語錄／單獨事件連貫的敘事脈絡。後世或許因對〈孔子世家〉過於熟悉，似乎並不特別強調此一敘事體式與史料的統整、融合之功，但若透過《漢書·司馬遷傳》之班固贊語，仍可見學者對此特色之察識：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⁷⁹

此則評論一般視為對司馬遷與《史記》的整體批評，卻也指出史遷處理史料的特色。此處雖非專論〈孔子世家〉，不過所謂「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涉獵廣博」、「貫穿經傳」，確實道出司馬遷統合、甄別史料，進而分類、重組的敘寫特色。

⁷⁷ 見哀二年《左傳》（《左傳正義》，卷57），文長不錄。

⁷⁸ 《論語·陽貨》：「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注疏》，卷17，頁2下-3上）

⁷⁹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737。

(二) 史料的多元擇取——以取捨三《傳》為例

承上所述，司馬遷面對的是先秦至漢初大量的孔子載述，〈孔子世家〉與〈仲尼弟子列傳〉正是對大量史料採擇、剪裁的成果，這也引出另一重要議題，即：史料的抉擇是否反映某種特定立場，尤其在漢代「經學」勃興的學術背景下，孔子的地位與評價不論在學術或政治上，均獲得大幅的強調與提升，則史遷之撰作是否呼應此一當代學風。透過太史公對史料的擇取，或可略窺一二。

上小節已提及《史記》廣泛採擇先秦諸子文獻，本節則由史遷對三《傳》的擇取進行考察。首先值得考究的是，〈孔子世家〉與公羊學之關係。由於史遷曾師事董仲舒，一般認為其學術——尤其是對孔子與《春秋》的認識——偏向董仲舒為首的公羊學。不過，單就對史料的取擇與敘事的效用觀之，《公羊傳》對〈孔子世家〉的撰寫恐怕幫助不大，最主要的問題在《公羊傳》的基本性質為解經，提及孔子事蹟者絕少，如定十年《春秋經》書「齊人來歸郚、讙、龜陰田」，《公羊傳》解曰：

「齊人曷為來歸郚、讙、龜陰田？」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公羊注疏》，卷 26，頁 8）

又如定十二年《春秋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公羊傳》釋曰：

「曷為帥師墮郚？帥師墮費？」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郚、帥師墮費。」

「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公羊注疏》，卷 26，頁 10 下-11 下）

在《左傳》敘事中，堪稱孔子為政時期最重大的兩項事蹟，《公羊傳》卻著墨不多，甚至以完全相同的理由——「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詮解之，對事件之完整性實無太多幫助。不過，《公羊傳》對「西狩獲麟」與孔子「作春秋」的關係，則大書特書，哀十四年《公羊傳》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公羊注疏》，卷28，頁7上-15下）

「獲麟」事亦見載《左傳》，⁸⁰「孔子作春秋」則最早見於《孟子》，但二者產生因果連結，則始自《公羊傳》。司馬遷在此一關鍵點上，兼採《左氏》與《公羊》之說：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⁸⁰ 文已見本文〈二〉之（一·1）。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會注考證》，卷 47，頁 80-85）

第一段之前半至「取之」止，近似《左傳》，後段再次融入《論語》之若干篇章，表達孔子的自述與感懷。而弟子顏淵死與「西狩見麟」二事之連繫，賦予孔子「道窮矣」而撰作《春秋》之動機，則近同《公羊傳》之邏輯。第二、三段則揉合《孟子》，強調《春秋》之義。總而言之，對於「獲麟」、「作春秋」二事的連結，〈孔子世家〉顯然以《公羊》之說為主，而結合《論語》、《孟子》加強論述，可見《公羊傳》在敘事方面雖少有助益，其學術立場則為史遷所接受、承繼。

若說《公羊傳》對孔子的學術／經學地位特別強調，則《穀梁傳》對孔子的載述，則偏重在不同的面相。最引人注意的即是其對「夾谷之會」的詳盡敘述，定十年《春秋》載：「夏，公會齊侯于頰谷」，《穀梁傳》釋之曰：

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穀梁注疏》，卷 19，頁 12 下-13 下）

此段載述之詳盡不僅與《左傳》不相上下，⁸¹對孔子言行的描繪，如「視歸乎齊侯」、「誅優施」等，甚至較《左傳》更為詳細、豐富。或許正因如此，〈孔子世家〉對「夾谷之會」的載述，大體採用了《穀梁傳》的敘事脈絡：

⁸¹ 《左傳》所載「夾谷之會」，已詳本文〈二〉之（一·2）。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

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旒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

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史記會注考證》，卷47，頁26-30）

兩相對照，可知《史記》與《穀梁傳》對此事之載述有數個共通點：一、「有文事，必有武備」之概念與論述；二、兩君相見、就壇揖讓的禮節載述；三、孔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且目視齊侯的行止描繪；四、命人誅優倡，「手足異處」的細節；五、明確指出因孔子的表現促成齊國歸還「鄆、汶陽、龜陰之田」的因果關係。凡此，皆可見《史記》參考《穀梁傳》之迹。

上述二事件，分別為《公》、《穀》二《傳》之孔子論述中最詳盡者，而《史記》皆採用之；另外，〈孔子世家〉更有多處採用《左傳》之載述，如「孟僖子將死」、「墮三都」等重要事件，皆以《左傳》所載為基礎進行敷衍。⁸²由此可知《史記》對三《傳》之運用，基本上蓋以敘事詳盡與否為首要考量，其學術立場雖稍偏《公羊傳》，但並未因此而特別凸顯或排斥其他特定文獻。

⁸² 說已詳本文之〈二〉。

(三) 敘事觀點與敘事意圖

承上所論，具體可見〈孔子世家〉敘事的統整性與史料的多元擇取，反映出司馬遷身為史家的客觀立場與知識學養。然而，綜觀〈孔子世家〉，仍有一些頗具特色的載錄，呈現出與先秦諸子不同而具有漢代特色的論述，值得特加述論，如長篇敘述孔子與「六經」的關係：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皦如，縱之純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詔、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史記會注考證》，卷47，頁68-75）

此處結合《論》、《孟》的相關論述，歷數孔子對《書》、《禮》、《樂》、《詩》、《易》的傳習，加上前述的《春秋》，完整建構了孔子與六經的學術淵源與知識體系，遠比前節所引《莊子·天運》之僅提及「六經」之名詳細許多。由此一具有經學特色的載錄，再由整體架構省察〈孔子世家〉之寫作，即可發現司馬遷對孔子與六經傳承關係的重視。就體例言，孔子一人之傳而稱「世家」，正取其學術傳承之綿延不絕。前人對此早已多所闡發，如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即稱：

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稱系家焉。（《史記會注考證》，卷47，頁1）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則謂：

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史記會注考證》，卷47，頁1-2）

由此可知，史遷立〈孔子世家〉，並非一般以「血緣關係」為核心之「父子」延續，而是以「學術理路」為核心的「師弟」傳承，而史遷之所以特別提出此一傳承六經的「學術世系」，自屬漢代經學觀念之影響。由《史記》又立〈仲尼弟子列傳〉，列舉孔門弟子之傳承、為王者師等事蹟，可證此一以孔子為「教化」之宗主，而「代有賢哲」的論述脈絡。相較之下，《孟子》雖也將孔子推崇為學術上之聖人，但較偏向「往上追索」孔子與文王、周公的連結；《史記》則同時開展出孔子「向下綿延」的學術系譜。此外，《孟子》之推崇孔子，主要因其個人學說理念之私淑與嚮往，並回應論敵之挑戰；《史記》則已無論戰之必要，故而較能專注於建構完整的孔子行蹟，並呼應漢代整體的學術背景。

若說上述此種關乎學術的論述特色，乃受漢代整體經學思惟的影響，則另一較具特色的敘事主題，極可能乃史遷個人觀點的展現：歷代注家皆注意到，綜觀〈孔子世家〉所敘孔子周遊列國的各種事蹟與主旨，「不用」堪稱最重要的「文眼」，明陳仁錫謂：

〈孔子世家〉以年為敘……又以「不用」二字為關鍵，曰「弗能用」、曰「莫能己用」、曰「不用孔子」、曰「既不得用于衛」、曰「魯終不能用孔子」，皆歎夫子道之不行也。（《史記會注考證》，卷47，頁2）

陳氏精準掌握史遷敘述孔子行蹟之核心主題，點出〈孔子世家〉羅列仲尼在各國之行事，小人或欲譖之、害之而使其不得不繼續周遊，國君或欲尊之、用之而終不能貫徹其信念，在在呈現孔子栖皇奔走而終無一用的無奈面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就敘事順序言，〈孔子世家〉在敘述孔子遍歷各國而皆不能用的經歷之後，

以「反乎魯」爲收束，指出孔子此後再不求仕：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記會注考證》，卷 47，頁 67-68）

在此「不能用」、「不求仕」之後，才接入上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云云，論述孔子與六經的關係。就時序言，孔子對禮樂雖沉潛甚深，但當然有很大的可能是在返回魯國之後，方正式整理六經做爲教材的學術傳承。不過，此一歷經「不能用」而轉入文章事業的模式，實與史遷個人之感懷互爲呼應，〈太史公自序〉云：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史記會注考證》，卷 130，頁 27-29）

史遷因李陵事件而「身毀不用」，想即前賢亦遭遇種種「不能用」之困頓，遂發憤堅持著書。其中細節當然有不少爭議——如「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不過我們實應認識到，正是司馬遷個人遭遇的體悟，造就此一歷史詮釋，其所述雖未必全然客觀或盡符史實，但仍屬史遷獨特之觀點。換言之，此一觀點，也可能隱約貫串〈孔子世家〉的敘述脈絡，故在情節安排上，先敘寫種種「不用」，再轉入刪述六經、廣收弟子的教學事業。上小節已經說明，「獲麟」與弟子死亡等對孔子的刺激，與其「作春秋」產生明確的因果連結，當是《公羊》學者所提出，史遷也確實繼承此一學術觀念。但綜觀〈孔子世家〉的敘述脈絡，則史遷顯然不僅強調「作春秋」一事，而儼然將視野擴大至孔子一生理想的「不能用」，並試圖將孔子「道之不行」的困頓，與其整理六經、奠定孔門系譜等學術事業，建立較爲全

面的因果連結，這或許正是司馬遷個人觀點的展現。

若回顧先秦時期孔子的三種形象：老師、良臣、聖賢，可以發現〈孔子世家〉確實統合了此三種形象並做出歷史解釋：首先，將孔子定位為「學術之聖人」，一方面並未在言詞上極端推尊孔子為「素王」或與古聖王並稱，而是明確給予孔子不亞於王侯，卻也符合史實的學術地位，可說融合了「聖賢」與「老師」兩種形象。其次，關於「良臣」一面，可看出司馬遷盡量採取各種先秦史傳、諸子之載述，盡力統整孔子事略與為政事蹟；更重要的是，相較於先秦諸子或不強調孔子為政的事蹟，或調侃其「不能用」、「遭忌」等負面載述，司馬遷將此類事蹟與孔子的學術事業連結，說明正因政治上的「不能用」，才使孔子能夠整理六經，從事教學，也才建立了弟子三千的孔門學術世家，傳習至漢而不絕。

五、結論

上文簡略梳理《左傳》、《國語》、出土文獻、先秦諸子、《公羊》、《穀梁》與《史記》諸書的孔子載述，而聚焦於「孔子形象」的變化與發展軌跡；也約略探論各書對孔子的評價、觀點與敘事意圖。整體而言，可由三方面總結其意義：

首先，以文獻性質言，可見經、史、子三種不同文獻，因文獻性質與撰述目的的差異，對孔子形象的敘述方式也產生不同的偏重。就敘事性最明顯的史書觀之，其載述整體而言較為平實、均衡，如《左傳》的孔子載錄雖繁複多樣——有徵引「仲尼曰」之言論者，亦有推崇孔子之段落與記述孔門學人事蹟者——但其所敘孔子仕魯之具體事件，仍較諸子書翔實合理，可見其學養富贍；《史記》則具有統整之傾向，博採諸家所記而重新編排、賦予背景脈絡，正式建構了孔子「完整」的生平事蹟。以談辯、論理為主的子書，則因時代、學派理論的不同，對孔子的論述與敘事也各有偏重。其共同點是往往透過「對問」形式，一方面訴諸孔子「老師」的形象為自身學說背書，一方面也透過此種富有運用彈性的體式，呈現各種多元的內容；其差異處則可能因時代與論說對象之異，對孔子形象的認識與運用遂有所變化，如皆推崇孔子的《孟子》與《荀子》，前者須面對論敵，故對孔子積極辯護、極力推崇，後者則處於孔子地位已大致獲得公認的時代，遂多相對平實的引述。而就漢代經學言，《春秋》三《傳》，除《左傳》兼具詮經、敘史特色之外，《公》、《穀》二《傳》皆以說解經義為主，孔子事蹟相對不多，

然或因學派、家法不同，對孔子之載述亦有偏重，如《公羊》強調「獲麟」，顯示出部分「天人感應」觀念，《穀梁》則詳寫「夾谷之會」，較《左傳》多出禮儀細節，亦可見其說經特色。

其次，關於出土文獻之孔子載述，因為絕大多數皆屬儒家文獻，且以「對問」為主，顯示其特重孔子之「老師」形象，僅有少數篇目涉及孔子作為「良臣」的不同面相。故若單就「形象」論之，則出土文獻截至目前，似不如傳世文獻擁有多種不同的孔子形貌，然仍可期待更進一步的發掘與研究。另外，就表現形式言，出土文獻中大量的孔門師弟對問話語，似可進一步思索出土文獻與傳世的「語類」文獻，如《論語》、《國語》等書的關係。考量當時的文獻流通、學說傳講特質，不少學者提出先秦文獻的抄寫與形成，或許正是奠基於口耳相傳的師徒關係，⁸³則出土文獻中大量的師生對問，對未來討論先秦文獻的發展與流傳議題，必能有所啟發與幫助。

復次，關於孔子形象的發展與嬗變，本文大體歸納出「聖賢」、「老師」與「良臣」三種形象，以及與形象相互配合的博學、善禮等焦點事蹟；此三種形象在不同時代、性質的文獻中各有偏重，如亦經亦史的《左傳》，一方面因重視各國政治事件與人物作為的「記事」特質，使其相對完整的提供了孔子作為政治人物／「良臣」的行事描寫；其重視道德與偏向儒家立場，則表現在強調、推崇孔子的「老師」身分與預敘孔門弟子之關係等層面；後世重視的「博物多聞」，則在《左傳》中所在多有而未見孔子之特出。相對的，《國語》以國別為綱領，重視「嘉言善語」的「記言」之體，其所收錄孔子各種展現博學之材的言論，使其形象較之《左傳》更傾向強調「博物多聞」，其敘事脈絡則頗顯不足。降即戰國，則孔子可稱「聖賢」的呼聲愈大，諸子間的論辯愈盛，《孟子》與《墨子》二書中孔子正反兩極的形象，可令吾人略窺此一時代孔子地位的爭讓之跡；不過，在孔子地位漸獲肯定後，此一論爭則稍顯和緩，諸子轉而運用孔子「定型」後的形象與事蹟，作為自身論說之資——如老師、聖賢、博學多識、厄於陳蔡等事蹟，也因此對孔子形象產生各種更富創造性的詮釋，如《韓非子》倡議「用刑」的孔子，《莊子》中孔子的博學反成譏評焦點，師弟關係也遭到翻轉、諧擬，一方面

⁸³ 此議題涉及中國早期書寫型態發展、文獻流傳方式、口頭與書面文本互涉等多重面向，遠非本文所能論及，相關研究可參考〔美〕柯馬丁：〈方法論反思：早期中國文本異文之分析與寫本文獻之產生模式〉，收入陳致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49-432。

顯示出諸子對孔子形象的不同回應、甚或挑戰，但若無「典範」，何來變創？這些豐富多元的型態，正說明了當世對孔子地位的認識，部分已逐漸穩固並獲得共識。不過，諸子雖各有發揮，大體而言對孔子的政治處境與「良臣」形象，可說一致著墨甚少，尠有超越《左傳》者，此或可歸因於諸子學術風格、論辯需求等因素所致。降及漢代，則因學術與政治皆有趨於一統的現象，《史記》對孔子形象的敘寫也展現了此一統整諸家的意圖；另一方面，由於經學的興起，對孔子的地位更形重視，建構出更完整的孔門學術體系；尤其特色的是，或許因史遷個人的遭遇與觀點，〈孔子世家〉的敘事情節，將孔子一生不得志的政治參與，轉化為其整理六經、傳道授業的內在動力，對先秦至於漢初各種分立不一的孔子形象，做了統整性的形塑與詮釋。

透過上述考察，可見不同時空情境、學派立場與文獻性質，甚至不同創作者之個人觀點，對「孔子形象」均有不同的發揮與偏重，也產生某些極端的發展。本文也試圖解釋、分析不同的孔子形象可能反映何種時代風潮，又代表何種學術意義與發展脈絡；在此考察之下，或許可說，儘管孔子形象豐富多樣，甚或彼此矛盾，但與其斷然判定真假／是非，不如嘗試以同理、欣賞的態度，省視在不同時空情境、不同理論與觀點的詮釋下，歷代學者對孔子如何做出相應的敘述，以及「孔子形象」此一重要的文化／學術象徵又如何轉化、運用於各種多元的文化、歷史情境之中，而發揮不同的效用。

引用文獻

- 孔穎達等：《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十三經注疏》本。
- 方勇：《莊子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王先謙主編：《清經解續編》，臺北：復興書局影印清光緒十四年（1888）王先謙《南菁書院》本，1972年。
- _____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王叔岷：《莊子校釋》，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6，1972年。
- _____：《莊子校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8，1988年。
- _____：《慕廬雜稿》，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
- 王錕：《孔子與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 司馬遷著，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方研究所，昭和七年（1932）。
- 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清華學報》新39卷2期，2009年6月。
- 朱曉海：〈孔子的一個早期形象〉，《清華學報》新32卷1期，2002年6月。
- 何定生：《定生論學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
- 李啓謙、王式倫編：《孔子弟子資料匯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年。
- _____、駱承烈、王式倫編：《孔子資料匯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年。
- _____、郭克煜編：《孔子研究資料》，山東：曲阜師範學院孔子研究所，1981年。
- 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0年6月。
- _____：〈《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臺大中文學報》第33期，2010年12月。
- _____：〈先秦敘史文獻「敘事」與「體式」隅論：以晉「欒氏之滅」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0期，2014年5月。
- _____：〈試論《左傳》「仲尼曰」敘事的經史學意涵〉，「第二屆中國經典文獻的詮釋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教育學院二十週年校慶委員會主辦，香港教

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合辦，2014年10月17-18日。

_____：〈《莊子》、《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北大臺大中國古典文學與文獻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2014年11月21-22日。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邢昺：《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十三經注疏》本。

林甘泉主編：《孔子與20世紀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姜義華、張榮華、吳根梁編：《孔子——周秦漢晉文獻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

胡適：〈說儒〉，《東方文化》1卷1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單行本印行，收入《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15冊，頁5-98。

韋昭注：《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夏長樸：〈子爲政焉用殺——論孔子誅少正卯〉，《臺大中文學報》第10期，1998年5月，收入《儒家與儒學探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4年。

孫星衍著，郭沂校補：《孔子集語校補》，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

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孫奭：《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十三經注疏》本。

徐彥：《公羊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十三經注疏》本。

徐聖心：〈「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臺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2年12月。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馬驢著，王利器整理：《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崔述：《崔東壁遺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康有爲：《孔子改制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張覺：《韓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章炳麟著，徐復注：《尙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陳偉：〈《君子為禮》9號簡的綴合問題〉，2006年3月6日，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
-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2006年2月19日，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
- _____：〈上博八〈子道餓〉補說〉，收入《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傅斯年：〈評「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原載《古史辨》，第2冊，頁139-141，收入《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4冊。
- 復旦、吉林大學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子道餓〉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1，2011年7月17日。
- 楊士勛：《穀梁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十三經注疏》本。
- 楊朝明、修建軍主編：《孔子與孔門弟子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
- 劉洪濤：〈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君子為禮》的拼合問題〉，2006年9月6日，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15。
- 劉師培：〈孔學真論〉，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
- _____：〈論孔子無改制之事〉，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
- 蔡瑩瑩：《敘事、論說與徵引——論《左傳》《國語》的典故運用》，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李隆獻指導，2013年。
-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香港：香港大學，1956年。
- _____：《孔子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
-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臺北：廣學社印書館影印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重雕山東尚志堂藏板，1975年。
- 顧頡剛：《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
- _____：〈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收入《古史辨》，第2冊，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臺北：古亭書屋影印明治四十四年（1911）日本明治講學會重刊本，1969年。

白川靜：《孔子傳》，東京都：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

淺野裕一：〈上海楚簡《君子為禮》與孔子素王說〉，收入《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臺北：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柯馬丁：〈方法論反思：早期中國文本異文之分析與寫本文獻之產生模式〉，收入陳致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Michael Nylan and Thomas Wilson. *Lives of Confucius: Civilization's Greatest Sage Through the Ages*, Crown Archetype, 2010.

“The Image of Confucius” in Pre-Qin to Early Han Texts

Lee, Long-shien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Confucius” in pre-Qin to early Han texts. Both extant works and recently discovered texts are examined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ccounts of the major events in Confucius’s life as well as his words and dee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the author studies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vergences in narrative strategies, themes, and value systems displayed across a range of texts in their portrayal of Confucius.

This paper mainly looks at the accounts in pre-Qin to early Han narrative and exegetical texts such as the *Zuozhuan*, *Guoyu*, *Shiji*, *Gongyang zhuan*, and *Guliang zhuan*, juxtaposing them against accounts in pre-Qin masters’ texts, as well as recently excavated texts such as the *Qinghua* strips, Shanghai Museum strips, and Guodian strips.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as the “good minister,” “sage/ worthy,” and “teacher/ master,” with each of these representing different ideological positions, character assess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larger trends in pre-Qin to early Han classical scholarship and historical studies, analyz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scenarios, scholastic positions, argumentative strategies, and value judgment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varying aspects of the “image of Confucius.” Through the theme “the image of Confucius,”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mutual importance of newly discovered texts and transmitted texts, and the fusion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and historical study in the pre-Qin to early Han period. Tracing these chang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he paper examines the divers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genres, narrative modes,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Keywords: Confucius, Narrative, *Zuozhuan*, *Guoyu*, *Shiji*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